

引进外资 功德无量

——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的两个根本观点

李罗力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内不少媒体上掀起了一股否定和质疑引进外资的风潮。有人认为要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来看待我国利用外资问题，关键是不能使我国的制造业处于对外资的依附地位，特别是不能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还有人认为，目前阶段跨国公司转移到我国的制造环节许多处在产业链条的下游，我国所输出的实际资源有相当多的部分成为外国人的收益而被外国人占有。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利用外资已经使我国投资收益逆差逐年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严重不对称所致，而我国货物顺差相当部分只能用来抵消外国投资者投资收益的汇出，这大大降低了利用外资的价值及意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不仅人民币资金不缺乏，外汇资金也比较充裕。而中国外汇资源的绝大部分在境

外，被外部使用，这样的状态，意味着中国利用外部资金越多，国内资金的剩余可能越多。因此，是否需要继续大规模利用外资值得进行深入思考。还有观点主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建立自己的技术体系和技术发展战略，不能指望外部的技术进步来推动本国的发展，否则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无法再发展了。也有外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提出，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反映了国内民间投资不旺的病症，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可能会导致对国内民营资本的压抑，等等。

其实，上述种种观点对于我们来说，绝大多数并不陌生。许多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出现，只不过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面目和声音出现而已。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些观点都有其正确合理的一面，但是我认为它们的根本弊病都在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看到了引进外资中局部的负面的因素，而丢掉或忘记了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巨大和正面的作用。更何况他们所担心的那些局部的负面作用，在中国改革实践中已被证明并不是无法逾越的，而是可以采取正确措施加以规避和加以克服的。

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究竟有多大的正面作用呢？我的看法是“功德无量”。也就是说，没有引进外资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或曰引进外资才是中国这 20 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一、引进外资才是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凡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都知道，从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几大瓶颈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银行呆帐坏帐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就始终在困扰着我们。这些问题今天解决了没有呢？我看没有一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但仍然在困扰着我们，而且有些甚至还越来越严重。然而，令人深思不解的是，中国何以存在这么多严重的瓶颈问题，且并未得

到根本或很好解决的情况下，还能连续二十多年保持经济健康高速的增长呢？为什么还会创造出全世界都为之叹服的中国经济奇迹呢？为什么还会在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新经济崩溃所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保持“一枝独秀”呢？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难以破解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我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取得难以想象的辉煌成就，其最根本和最直接的推动力，就是在引进外资（主要是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非常巨大的且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的成功。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总是联在一起成为大家的口头禅，但这其中包括了两层截然不同的含义。实际上“改革”不等于“开放”，“开放”也不等同于“改革”。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处于封闭集权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来说，改革确实是一切转变的前提，特别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从长期统治人们头脑的教条和保守观念转向观念不断革命和创新的前提，是从一切服从领导主观意志的人治社会转向服从客观规律、尊重民主法制社会的前提。但是严格地说，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直接动力。当然我们不否认，在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进程中，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改革都是一种巨大的渗透力量和内在的动力，都在指导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但是从改革措施的直接效果来看，除了80年代初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空前地调动起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并把中国的历史进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之外，其余的重大措施都很难做出这样的评价。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后，改革就开始处于胶着状态，当时提出的几项主要重大改革任务，包括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直至政治体制改革等等，大多至今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有些甚至还没有破题，因此很难说上述哪一项改

革措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直接的，十分明显的巨大推动作用。

相反，中国的“开放”过程却是把中国推向经济增长高峰的主要的直接原因。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大战略，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中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提出要摸着石头过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开发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这一系列大政方针之后，中国就走上了一条以改革为动力，从点到面不断扩大开放的发展之路。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处在一种只有极个别的地区，比如说沿海几个特区、几个经济开发区开放的局面。那时候，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开始抛弃计划经济并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但实际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那种自我循环的封闭思维和封闭运行方式，包括那时候所采取的改革思路实际上都没有脱离这种思路和这种运行方式。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和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心目中，“开放”并没占有太大的地位，“开放”和“改革”实际上是脱节的。但是后来发现走不出去了，或者说是走到“死胡同”里了。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都应清楚地记得，“六四”风波的一个经济导因，就是1988年的物价改革“闯关”，导致了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风潮，致使当时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广大民众对现实强烈不满，最后成为导致“六四”风波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所谓的物价改革“闯关”，就是典型的用封闭的经济思维模式来处理开放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失当举措，最后酿成重大恶果。而“六四”风波又在经济政策上引发了另外一个更糟糕的直接后果，那就是长达三年的“治理整顿”。这三年是中国经济的大停滞和大闷局，再加上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封锁和包围，如果不是邓小平南巡打破这个闷局和僵局，中国的经济发展真不知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毫无疑问，邓小平南巡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转折

点，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它最大的功效之一就是彻底地打开了中国“开放”的大门，就是真正把中国的“开放”与中国的“改革”联在了一起。我讲这点是有根据的。众所周知，邓小平南巡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把深圳的经验和模式传播到全国，引发了全国大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浪潮，而且树立起中国开放的第二个典型——上海浦东，为中国进入第二轮更高层次的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再回头来看，由小平南巡所引发的全国范围的开放和引资浪潮，特别是各省市各地区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各种方法和条件大量引进外资，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国十多年经济大发展的一个起点。尽管后来出现了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但这些都不能抹煞小平南巡在中国引发的巨大历史转折作用和历史推动作用。

回顾这段历程，实际上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地方政府巨大的热情和积极性，第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进。这两个要素的结合，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主要动因。

中国的引资成功还有一个重大的独特因素，就是港台华人资本（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重要资源）直接投资的重大示范效应。从 70 年代末起港资率先大量涌入珠三角，整个 80 年代成为香港制造业北移的过程；而后 80 年代中后期台资也开始大量涌入。这个时期港台投资尽管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而且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但是它们对造就中国最基本的外商投资环境（基础设施、政策条件、劳工队伍、开放观念、市场需求等等）居功至伟，特别是它们在中国大获其利，使其他国外资本看到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巨大好处。因此也才会出现 90 年代后的欧美日等国际资本包括港台大资本对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风起云涌的大规模直接投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印证了我的这个观点，它在 2003 年发表的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挑战》的研究报告，最后的结论是：“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才是促进中国 25 年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二、扩大就业才是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贡献

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大大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且由于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企业在内地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了国内企业的产品品种，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劳动力和管理及技术人才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流动，导致了跨国公司技术和管理外溢，从而带动了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使国内许多领域与行业的经营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大大促进了产品与服务形态的多样化，质量的显著改善以及运营效益的提高。也有学者著文指出，引进外资带来的不仅是一般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带来一种观念和文化，一种新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这种个人和社会观念的解放，使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追求和动力，并对其各种管理制度、运行机制、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建设都将产生深远和长期的影响。还有人认为，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对外国文化的辩证吸收和对本国文化的创新等，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还在继续产生作用。凡此各种观点，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没有外资的参与，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此迅速和惊人的发展变化。

上述学者们提出的观点我都同意，但是我认为他们都疏漏了引进外资的一个最大最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它对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所产生的重大作用。而在我看来，只有这一点才是它对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贡献。

不过，我估计之所以这个问题很少被人提起，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很难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经合组织（OECD）2003年的研究报告中讲到，以2000年年底为准，中国国内的外国企业所雇用的劳动者达610万人，占中国劳动力的1%左右，同时占从事制造业的劳动者的1.7%。我可以很肯

定地说，这个数字是大大地被低估了。

我虽然没有全国的统计数据，但是手头两份重要的研究报告，可以对珠三角地区为外资企业服务的劳工数量做出基本的判断。一份报告是 2002 年香港工业总会和香港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香港在珠三角的制造业调查报告》，另一份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2004 年所做的《大珠三角整合策略研究报告》中有关珠三角外来打工情况调查的分报告。

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报告指出，2001 年，大约有 1000 万员工为香港公司在广东的制造业直接或间接服务。大约 475 万员工为香港的三资企业工作，而其它的 504 万员工则为香港在内地投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工作。其中东莞 403 万，其次是深圳（258 万）、惠州（87 万）、中山（61 万），还有 134 万分布在广东其他地方。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调查报告则指出，据统计，2003 年珠三角地区大约吸引外来劳动力 1500 万左右，而且都是在中等以上的城市。外来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制造业方面，而制造业方面又主要是分布在外资企业。根据广东省 2000 年人口普查的资料分析，外来劳动力 80%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制造企业。报告还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数据，其中讲到，据估计，到 2003 年深圳总人口已达到 1000 万以上，其中增加的主要是龙岗和宝安两区的外来工，数量在 700 万以上。报告还以湖南省为例，指出该省 2002 年有 665 万民工在珠三角、上海、厦门、北京等地打工，其中 70%是去了珠三角，而在东莞就有 100 多万湖南民工。

由此可见，仅珠三角地区为港资和其他外资打工的就业员工就达到至少 1200 万(1500 万的 80%)，比 OECD 报告所列举的全国数据高出一倍以上。而且这个数据仍然是偏于保守的和低估了的，因为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报告指出，它们的调查统计信息是不全面的，“小型公司的信息和统计要远远少于大型工业公司。中国许多工厂的制度上的原因使得他们低估了所雇用的员工数量”。“广东有不成比例的小公司，信息很难得到，尽管广

东许多这类公司已经存在了 20 年左右”。

我们还可以根据另一组数据，对全国的情况做一个粗略的判断。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调查报告中指出，2003 年我国共转移农村劳动力大约为 1.7 亿，其中有 1 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是转移至县城及以下的镇，7000 万是转移到中等以上的城市。如果这 7000 万中有一半是进入制造业企业，同时像珠三角统计的比例那样有 80% 是在外企打工（这一点我认为基本可以成立，因为国企急剧萎缩和民企相对弱小，使得外企成为消化外来劳动力的最大平台），那么至少有大约 3000 万外来劳力是在为各种各样的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服务。这还不算转移至县城及以下的镇的另外 1 个亿农村劳动力，因为我们知道沿海地区的许多县以下城镇，都已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基地。如果把这部分人中有 10% 至 20% 也计算进来，那么全国就有大约 4000 至 5000 万的劳动力在为外商直接或间接地打工。其实我们的这个估计也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如果仅广东一个省 2001 年给港资企业打工就有 1000 万人的话，那么全国那么多省，那么多外资企业，而且又过了这么几年，就业人数总量是广东的 4-5 倍也并不稀奇，甚至即使再高估一些恐怕都不为过。

为什么我把解决就业看作是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贡献呢？首先它大大缓解了中国在这二十多年里由于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国企工人下岗问题，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根本的前提。如果没有外资企业所创造的几千万就业岗位，只凭中国的国企和民企绝对无法消化这些农村转移和城市下岗的劳动力，那么中国经济不但不可能出现奇迹，甚至反而早就陷入混乱和动荡之中了。

其次，引进外资除了具有缓解就业矛盾这个直接效应外，还带来其他两个重要的“溢出”效应。

其一是它间接为解决中国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发展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贫富人群之间和贫富地区之间的矛盾，带动了落后地区的进步。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调查报告指出，据估算，整个广东省外来劳动力总数大约在 1500 万人左右，每年打工节余汇回家乡的总金额可达 500 亿元以上，相当于湖南、江西、四川等几个省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据广东省邮政局统计，仅 2003 年 1 至 8 月，全省累计开汇票 3792.02 万张，金额 409.46 亿元，其中外来民工向家乡汇款就占了 80%，也就是 325 亿元左右。东莞外来工通过邮政汇出金额一年多过一年：1999 年为 119 亿元，2001 年为 137.6 亿元，2002 年为 142 亿元。深圳外来民工在 700 万以上，每年汇回收入大约 200--300 亿元。据深圳的四川省办事处估计，迄今在深圳打工的四川人超过 40 万，他们每年向四川老家的汇款金额就超过 20 亿元。

另据统计，1995 年，四川向外省输出民工达 518 万人，寄回家乡的汇款为 170 亿元；2001 年为 560 万人，汇款为 235 亿元，占当年全省农民平均收入的 29%；2002 年，川渝分治后，出川民工已近 600 万人，汇回款额 247 亿元，占当年全省农民平均收入的 30%。

上海财经大学于 2000 年 7-8 月，在广东做了一次外省民工问卷调查，统计分析表明，这些外地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比其原本在家乡做工或务农的月收入水平平均提高 3.23 倍，由 144 元提高到 611 元；每个民工平均每年往家汇款 2606 元，占其家庭年总收入的 28.7%。河南省劳动厅驻东莞办事处也曾对东莞豫籍民工作过调查，发现从事最多行业中的服装、电子、制鞋业的一般工人，其月工资连加班费为 600-700 元，由于绝大多数工厂都包吃住，加上十分节俭，因此不少人每月能寄回家 400-500 元，一年寄 5000-6000 元回乡的大有人在。

永州市是湖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全市输出劳动力 70 多万人，外出民工们每年寄回的劳务收入将近 20 亿元。湖南省浏阳市荆坪村有 800 多青壮年劳动力，其中 200 多人在深圳特区打工，每年春节期间村子里都很热闹，出门打工的人带回了外面世界的光鲜气派。每次过完年，又有一批新人被带出去。这个村子外出打工的农民月收入水平最低的 400 多元，高的 800

多元，有的管理人员月工资收入高达 1000 多元。如果按一人一年消耗 500 斤口粮计算，全村一年就会省下 10 万斤粮食，出去的劳动力多了，村里人多地少的压力也就随之减轻了。村民收入多了，盖了不少新房子。

以上一些统计数据和鲜明生动的事例，充分说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沿海发达地区，既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也对增加落后地区财政收入及提高中西部省区人均收入水平具有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些流入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并非全部进入外资或三来一补企业，但至少他们之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是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如果按照我们上面的估计，现在全国有 5000 万左右的外来劳动力在各种外商企业中打工，并且每年平均每人汇回家乡 2000 至 3000 元的话，那么引进外资每年就会对全国落后地区产生 1000 亿至 1500 亿的“溢出”财富效应。这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引进外资解决中国就业人口的第二个溢出效应，是它进一步提升和扩大了中国的市场潜力，形成中国经济发展条件的良性循环。

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世界投资者向往的宝地，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具有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潜力。这个市场潜力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几亿甚至十几亿人口都开始具有了一定的甚至是相当的购买力。然而就在 70 年代甚至 80 年代，还有多少人在抱怨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是永远摆脱不掉的沉重包袱和累赘，但是这些年来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首先有了相当的购买力。然而这还远远不够，这还不足以形成越来越提升和越来越扩大的市场潜力，而这个过程恰恰是越来越多的落后地区转移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到外商投资企业来打工，每年能够对中西部地区产生 1000 至 2000 亿的溢出财富效应，使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也有了一定的购买力。市场的扩大进一步吸引外资的进入，而外资越来越多的进入又可以

更多地容纳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同时产生出更多的财富溢出效应，这样就使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上述种种观点，都从各个角度证明了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和提升作用。事实上这些观点还不够详尽，不够充分。例如大量引进外商投资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资金短缺的矛盾，带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也带来了中国国力的大大增强，带来了中国国际威望的大大提高。凡此种种，如果没有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全方位开放，没有国外投资的大量引进，仅凭中国完全依靠国内资源“自力更生”地去发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总之，正是由于中国不断地采取了扩大开放的政策，不断地大量引进外资，因而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带来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中国自主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大量改善，带来了中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因此才会大大缓解中国内在的发展瓶颈和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条件是解决不了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

【主要参考文献】

- 【1】《经济决策者参考》（2003年8月第15期）。
- 【2】香港工业总会等：《香港制造业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报告》（2002年）。
- 【3】马春辉：《珠三角地区外来打工情况调查报告》（2004年7月）。

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脑库快参》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

《脑库快参》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高层管理者。

《脑库快参》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主要内容，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发表富有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

《脑库快参》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和政策性，努力做到思想敏锐、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可读。

《脑库快参》将不定期编印，每期一个主题，每篇文章三、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

《脑库快参》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件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及学者积极参与。

地址：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邮编：518029

电话：0755-82487878、82471317

传真：0755-82410997

网址：<http://www.cdi.com.cn>

联系人：郑宇劼 电邮：zyj@cdi.com.cn

责任编辑：张朝中 电邮：zhangchzh@cdi.com.cn